

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高質量發展



議事論事

盧金榮

香港國安法實施5年，充分印證了國家安全和香港發展的關係。這5年來香港由內耗動盪到恢復穩定，以至今日進入由治及興的關鍵階段，工商界對此深有感觸。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在香港國安法公布實施5周年論壇致辭時，寄語香港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加快推進香港由治及興，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進程中發揮更大作用、實現更好發展。行政長官李家超強調必須全面貫徹落實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同時把握好發展的新機遇，積極發揮「內聯外通」的優勢，實現新飛躍。

香港當前正進入重要的發展階段，推動更高質量的發展，需要更高水平的護航，不論是三大中心、八個重點領域發展中心的強化和建設，都需要更安全的環境讓社

會集中精力謀發展。香港社會不能好了傷疤忘了痛，必須把維護國安貫穿「一國兩制」實踐的全過程，全力支持特區改革促進發展，開創香港發展新局面。

最安全穩定的投資環境

香港國安法實施5周年，《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亦生效一年多，這兩部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加上中央駐港國安公署和特區國安委，為香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鑄造了銅牆鐵壁，為香港發展打造了堅固屏障，更為全世界的投資者提供最安全、最穩定的投資環境。

沒有安全和穩定，一切都無從談起。在香港國安法實施5周年前夕，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公布《2025年世界競爭力年報》，香港的全球競爭力上升兩位至全球第三，是2019年後香港首次重返三甲。這個成績不單是香港競爭力的肯定，對特區政府施政的認同，而且在2019年之後香港重回世界三甲，再次印證了「利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的道理。對於2019年「黑色暴亂」的慘痛日子，香港各界至今仍歷

歷在目，暴亂不但為香港的社會秩序帶來巨大破壞，更對香港的營商環境造成極大的摧殘，大批商舖被砸，市面到處破壞縱火，香港經濟陷入嚴重的惡性循環。

在這個嚴峻時刻，中央一錘定音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迅速扭轉乾坤，大批暴徒及違法人士相繼被捕入獄，社會治安迅速恢復，反中亂港勢力兵敗如山倒，「愛國者治港」原則在香港全面落實。國安法實施後「一法定香江」的說法不但沒有誇大，更是準確地指出了國安法的「定海神針」作用。

香港今日之所以能夠掙脫政治內耗泥濘，排除亂港勢力干預，行政立法互相配合支持，全力推動香港發展，這一切的根基正在於香港國安法的出台和護航。工商界對此更是有最深刻的感受。香港國安法為香港帶來安寧的社會，商業環境更穩定，現在大街小巷已經恢復了以往的熱鬧，商家們能夠安心做生意，顧客和旅客們也能放心消費，穩定的社會是商界最關注的。在國安法律的護航下，香港法治回歸，商業秩序更加井然，營商環境進一步優化，

投資者信心倍增，這正是香港國安法為香港營商環境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亦再次印證了安全和發展互為表裏，不能偏廢的道理。

中央高度重視香港的長治久安，只有穩定安全的環境，香港的發展才會有穩固基礎。李家超特首領導下的特區政府，施政一大亮點就是統籌好安全和發展兩個大局，既全力構建維護國家安全屏障，亦全面發揮香港「一國兩制」優勢，做好「超級聯繫人」的角色，深化國際交往合作，全力拚經濟惠民生。香港當前正進入重要的發展階段，在香港國安法的護航下，社會各界可以集中精力、一心一意謀發展。

全力支持政府改革促發展

香港要維護好行政主導體制，提升特別行政區治理水平，以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期望各界凝聚改革共識，創新改革舉措。中央一直充分肯定李家超特首和特區政府的工作，在香港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更期望香港可以改革促進發展。行政長官和

特別行政區政府是香港的當家人，也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責任人，更要主動識變應變求變，在改革中打開發展新局面，當中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更關係香港未來。北部都會區是「香港未來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長遠發展」引擎，夏主任在香港進行考察調研期間，亦表達對北部都會區發展的重視。

作為特區政府的旗艦項目，北部都會區的面積約佔香港三分之一，不僅關乎香港長遠土地房屋、產業和競爭力發展，更是香港發展的新引擎，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的關鍵節點，是香港經濟「突圍」的關鍵一環。**推動北部都會區提速提效發展，關鍵是要勇於改革、敢於破局、不斷創新。**李家超特首亦表示會深化「片區開發」模式，簡化流程吸引市場力量參與，體現「時不我待」的緊迫性。相信在國安法的護航，特區政府有力推動，工商界全面配合，以改革推動北部都會區全面加快發展，為香港的由治及興注入強大動力。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

國安法助力香港優勢賦能



議論風生

衛昕

香港國安法5年來的實踐雄辯地證明，國安法是保持香港獨特優勢的關鍵，也是推動香港邁向由治及興的保障。在香港國安法的護航下，香港社會重歸秩序，法治更趨完善，營商優勢凸顯，愛國情懷昂揚。今天，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放眼寰球，地緣博弈加劇、保護主義抬頭、金融風險暗湧，香港維護國家安全與發揮獨特優勢的雙重使命，從未如此緊迫。因此，筆者認為，唯有以國安為基、以優勢為刃，香港方能在驚濤駭浪中破浪前行，為國家發展注入強勁動能。

一、築牢安全防線：抵禦風浪的「銅牆鐵壁」

國安法實施成效卓著，但風險挑戰遠未根除。近年來，在美西方對華遏制升級背景下，香港作為國際樞紐，面臨貿易打壓、金融掣擊、信息滲透等非傳統安全威脅。因此我們必須要築牢安全防線，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統領，構建全局防護體系。

首先，香港要築牢金融安全「防火牆」：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更是國家金融改革的試驗田，因此面對的風險更加巨大，香港需強化跨市場風險監測，提升應對國際資本異常流動能力。例如加快探索與內地金融監管部門建立系統性風險預案協作機制，針對資本異常流動制定聯合應對方案等。

其次，現時再出現2019年修例

風波的「硬對抗」風險降低，然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會利用民生議題、社交網絡等煽動社會對立，企圖用「軟對抗」的方式破壞社會穩定，這就要求我們既要與「軟對抗」堅決鬥爭，也要關注社會民生的痛點，及時解決，防止民生問題政治化，同時針對外部勢力藉社交媒體散播虛假信息，需依法採取打擊行動，防止市民誤信謠言。

二、深融國家大局：釋放「超級聯繫人」的乘數效應

中央堅定支持香港保持獨特優勢，「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特點是香港核心競爭力所在，以發展來解決國家安全問題，統籌發展與安全。在這裏，筆者認為可以從三個方面發揮香港「超級聯繫人」的作用：

第一是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打造大灣區「核心引擎」。北部都會區佔香港總面積約三分之一的，被視為破解香港住房、醫療、就業、青年發展等民生難題的新機遇，不僅為香港發展帶來重大機遇，是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的核心引擎。因此香港社會需要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的速度，同時更要盡快完善產業政策，鼓勵更多的重點企業落戶北部都會區。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已匯聚超500家研發機構，未來需打破制度壁壘，推動「深圳研發—香港融資—灣區製造」全鏈條協同。

第二是不斷深化將香港打造成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政策。截至2025年3月底，香港各項人才入境計劃共收到逾46萬宗申請，其中超過30萬宗獲批，約20.3萬人才抵港，這足以證明香港對於全球人才的吸引

力。因此香港需要不斷完善配套設施，特別是需完善子女教育、稅收優惠等配套，建設「國際人才社區」。

第三是升級香港樞紐功能。香港「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為助力我們國家政策和企業「走出去」打下了基礎，因此在未來香港應該不斷升級自身的樞紐功能，例如拓展人民幣離岸市場深度，推動數字人民幣跨境場景創新等。

三、不斷強化治理：破解深層次矛盾的「金鑰匙」

行政主導體制的高效運行是香港發展的制度保障。自本屆特區政府上台以來，在破解住房、土地供應以及地區治理等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彰顯「愛國者治港」的優越性。未來香港社會需要在產業轉型以及建設智慧型政府等方面繼續努力，應對機遇和挑戰，例如，助力中小企轉型電商以及打造直播平台，在建設智慧政府方面則可借鑒內地「一網統管」經驗，構建城市運營數字孿生體，提升應急響應能力。

回望來路，國安法重塑了香港的法治根基與社會生態；展望前程，香港肩負着更為光榮的國家使命。當「愛國者治港」原則深植治理體系，當國際金融中心的光環與科創轉型的活力交相輝映，香港定能化「優勢」為「勝勢」。這座城市的命運早已與祖國緊密相連——以安全護發展，以發展促安全，東方之珠必將在民族復興的壯闊征程中，綻放出更加璀璨的時代華光。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廣西僑聯青年委員會副會長

引入新思維優化社區設施

多年來，市民購買新鮮糧食（買餸）的方法不斷增加，由傳統的露天街市、公眾街市，到超級市場、私營街市、街舖連鎖店，甚至網上購買等，五花八門；縱然如此，公眾街市目前仍是市民「買餸」的主要途徑之一。我認為，公眾街市的定位暫時不會改變，即繼續方便市民以相宜的價格購買種類多元化的糧食。

可是，即使主要定位不變，亦不代表公眾街市的概念、設計應該一成不變。近年不少內地生鮮連鎖店搶攻香港市場，而且選址都是地舖，十分方便；反之，市民「幫襯」公眾街市則動輒要上落來回不同樓層才買齊乾貨濕貨肉類海鮮蔬菜水果，吸引力大為下降，對長者而言上上落落更是困難。其實，早在七年前，有關部門已提出要在公眾街市引入新的設計以便推行現代化管理，以符合當時零售環境下顧客的期望，例如攤檔應分佈於街市大樓的地下及一樓，方便市民進出——這目標現在仍未見實現。

以西營盤正街街市為例，由於當局為整合資源，計劃將正街街市的商戶搬遷到西營盤街市，本來無可厚非。但問題是，商戶原本在位處地面及較下層經營，但當局卻安排他們搬到西營盤街市的頂層。有不少商販反映，擔心老顧客會捨棄他們，改為「幫襯」其他位於低層位置的商戶，屆時將生意大量流失，令他們難以經營。

改變街市上層用途

另外，當局花了超過兩億元翻新的香港仔街市，早前出現商戶退租潮，據悉目前空置率接近兩成。我經常到該處視察，發現街市頂層人流明顯稀少，而且在設計上有一條長形走廊，令市民望而卻步，根本不想走進去。香港仔街市為「街市現代化計劃」首個翻新項目，翻新

後反而落得如此場面，反映對街市現代化的概念掌握落後於時勢。

隨著售賣新鮮糧食的街舖連店，甚至網上購買等，五花八門；縱然如此，公眾街市目前仍是市民「買餸」的主要途徑之一。我認為，公眾街市的定位暫時不會改變，即繼續方便市民以相宜的價格購買種類多元化的糧食。可是，即使主要定位不變，亦不代表公眾街市的概念、設計應該一成不變。近年不少內地生鮮連鎖店搶攻香港市場，而且選址都是地舖，十分方便；反之，市民「幫襯」公眾街市則動輒要上落來回不同樓層才買齊乾貨濕貨肉類海鮮蔬菜水果，吸引力大為下降，對長者而言上上落落更是困難。其實，早在七年前，有關部門已提出要在公眾街市引入新的設計以便推行現代化管理，以符合當時零售環境下顧客的期望，例如攤檔應分佈於街市大樓的地下及一樓，方便市民進出——這目標現在仍未見實現。

我亦希望在整合或設計各區公眾街市時，要考慮各區自身的特色。例如正街街市所在的中西區，區內有特別多單幢樓，很多時這些業主需要就大廈事宜開會亦找不到地方，如果中西區街市的上層增設多用途室，便能為他們帶來方便。

最後，公眾街市的管理模式已沿用多年，現在是時候檢視並優化。現時各公眾街市均設有「街市管理諮詢委員會」，由食環署代表擔任主席，委員包括街市檔戶代表、清潔和保安承辦商，以及區議員等，就改善街市管理及經營環境與署方交換意見。

其中一個改善公眾街市管理的方向，就是擴大「街市管理諮詢委員會」的職權，例如賦權委員會可就特定範圍內的日常管理問題作決策，例如街市內部商販售賣貨物的組成、籌備節日促銷活動等。這樣一來，街市租戶的參與較多，可以提升其歸屬感，令他們有動力去投入街市的改良和進步，改變現時只由食環署「話事」，改變來得太慢的情況。另一方面，擴大「街市管理諮詢委員會」的職權對現行制度的改動亦不算太大，相對較易落實，相信值得當局考慮。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

為什麼說歐美大西洋關係進入尾聲？



國際觀察

宋魯鄭

冷戰結束後，全球地緣政治發生了兩大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一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崛起。二是維持全球秩序最重要的力量以及主導國際事務的歐美國大西洋關係實質性走向尾聲。

歐美國大西洋關係定型於二戰，牢固地發展於冷戰。其相同點有二：一是有共同的敵人：要麼是納粹德國，要麼是蘇聯。二是博弈的主戰場在歐洲。

歐洲不再是美利益中心

在這個背景下，歐洲願意接受美國的主導，美國也願意約束自己，既遵守雙方共同制訂的規則，也重視雙方的團結。

但冷戰結束後的三十多年，雙方既沒有共同的敵人，歐洲也不再是美國的利益中心。在歐洲看來，俄羅斯威脅到它的安全。但在美國看來，中國的崛起威脅到了它的霸主地位。以至於今天的國際現實中，中歐關係優於中美關係，美俄關係經常優於歐俄關係。

所以在這短短的三十多年裏，雙方在

小布什時代、兩次特朗普執政時期發生了激烈的衝突。甚至歐美關係被視為典範的奧巴馬時期，也第一次提出亞太轉移，率先啟動了從大西洋轉向太平洋的戰略。

非常耐人尋味的是，冷戰後，在國際事務中，歐洲的主張逐漸演變為倡導多邊主義，強調聯合國是跨國際行動的合法性來源，並以此與美國對抗。2003年法國和德國聯合中國、俄羅斯組成和平聯盟，共同反對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並要以行使常任理事國否決權迫使美國繞過聯合國採取行動，但付出了重大的道義代價。但此前僅相隔四年的科索沃戰爭，歐美並沒有徵得聯合國授權就對一個主權國家採取了軍事行動。

這其中的原因顯然並不僅僅是雙方再無共同敵人，歐洲也不再是主戰場。

從歷史上看，二戰結束之前，歐洲一向是大搞單邊主義的。美國則倡導尊重國際規則。現在雙方完全相反。變化的原因則是實力。現在的歐洲已經喪失了實行單邊主義的能力，儘管它可以包裝成自己吸取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不能再爭奪霸權，要從過去的實力均衡原則轉向以規則和法律為基礎的一體化。事實上，假如未來歐洲再度擁有了可以奉行單邊主義的實

力，它仍然會回到十八和十九世紀。

當歐洲實力衰弱，它自然重視國際規則，也反對任何一個國家的單邊主義，這樣弱小的一方才會更安全。強大的美國則要保持行動自由，不受任何約束，這妨礙了更能保護弱小者國際秩序的建立。這就是2003年老歐洲和美國攤牌的原因。

此外，在冷戰時，歐洲雖然實力遠遜於美國，但仍然能夠對美國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和約束力，這也成為它能夠保持在全球事務中地位的一個重要因素。但冷戰結束後，歐洲發現自己連配角的地位都要保不住了。美國甚至連歐洲支持的象徵意義都不在乎。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和俄羅斯的談判，歐洲都上不了談判桌。這一方面是歐洲無能，連發生在家門口的衝突也解決不了，仍然是依賴美國出手解決。另一方面沒有了共同敵人，美國也無需為了維持歐美國結而約束自己。所以歐洲反對美國單邊主義的另一個含義實質是要繼續保有對美國的影響力。

所以不難理解的是，在俄烏衝突之前，歐洲和中國、俄羅斯維持了遠比美俄、美中更好的關係。在無法直接約束美國的情況下，歐洲只好「打中國牌」、「打俄羅斯牌」來影響和約束美國。

最後還要說的是，二戰以後歐洲為了避免再度發生戰爭走向了邦聯性質的聯合之路。摒棄武力、以談判和經濟合作為手段，通過尊重和運用國際規則來解決問題，並以此實現了長達八十年的和平與繁榮。以西方文明「三人行我必為師」的特點，歐洲自然會認為自己的成功模式必然適合於全世界。這既是它的「軟實力」，也是它影響全球事務的主要手段。比如就在美國撤出阿富汗十天之前，歐盟還警告塔利班不可武力奪取政權，否則會被國際社會孤立，呼籲雙方立即恢復實質性談判，結束暴力，永久停火。雖然在國際現實面前根本行不通，但確實反映了歐盟模式的特點以及試圖以它的模式行銷世界的意圖。

雙方行為模式不可調和

但美國的行為模式仍然停留在「叢林法則」階段或者霍布斯所說的「你死我活的無政府狀態」。儘管美國的行為更符合國際現實，但客觀上卻是對歐洲模式的否定。雙方在這個層面的衝突也是不可調和的。

所以即使拜登執政，也一再無視歐洲的利益甚至損害歐洲的利益。第一件就是2021年8月阿富汗撤軍並未和歐洲協商，給

歐洲的撤離造成困難，以至於時任歐洲外交高級代表博雷利不滿地說：「沒有人詢問歐洲人的意見」。緊接着不到一個月，搶走法國和澳洲的巨額潛艇訂單。以下的事件則是俄烏衝突發生之後：2022年8月出台保護主義色彩深厚、損害歐洲產業發展的《通脹削減法案》。同月，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竄訪台灣，拜登並未進行阻止，激化了台海形勢。此時的歐洲正全力應對俄烏衝突，自然不希望美國再去挑釁其他大國，因此非常不滿。此外，美國藉俄烏衝突之際高價向歐洲出售能源。試想在冷戰時，美國是絕無可能如此行事。

在世界各國看來，當歐洲面對二戰以來最大的軍事衝突，迫切需要美國支持的時候，打着大西洋主義旗號的拜登卻絲毫不顧及歐洲的利益，甚至火中取栗。那麼隨後上台的特朗普，在安全、價值觀、國際秩序方面都對歐洲構成威脅就毫不奇怪了。

總之，從歷史的角度，由於以上原因，歐美國大西洋關係已經走入尾聲，「美國人來自火星，歐洲人來自金星」就是這種關係的寫照。

旅法政治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